

地理勢態與教育取徑——以西江學院創建為例

◎ 侯其強

在社會理論研究中，我們常常給予社會、歷史、思想、意識等相對自律性，往往使得地理（空間）的研究依附於這種自律性，地理（空間）遭致湮沒，這些社會理論包括馬克思的理論。當代美國著名地理學家大衛·哈威（David Harvey）研究發現，空間因素在馬克思的理論當中是缺失的。鑒於對地理（空間）的這種理論狀況，引入人文地理學的空間理念以深入研究教育現象不失為一個富於探索性的契入點。

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理論中，普遍重視「空間的生產」，因而拓展了「空間性」這一術語的意義。美國地理學家愛德華·W·蘇賈（Edward. W. Soja）認為，以社會為基礎的「空間性」有別於空間本身，是社會組織和生產人造的空間¹。進而，「空間性和時間性，人文地理和人類歷史，在一個複雜社會進程中相互交織，這個進程創造了一系列不斷發展的空間性，創造了社會生活的空間——時間結構，它不僅為社會發展的大型運動、而且為日常活動的迴圈實踐賦予形態。」²受到蘇賈的啟發，我們可以將空間本身和運動、實踐聯繫起來，在「過程哲學」中將因運動和實踐所帶給空間本身的勢能和狀態予以重新表述。當空間本身時間性地具體落實為某一個地域時，這種重新表述就稱之為「地理勢態」³。

西江學院⁴的創建基於雷沛鴻對這一地理勢態的理解和把握。他說⁵：

我們深感黃河、揚子江流域的中原文明，日趨於古老，東南海岸的低原文化，則受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影響，為金融資本、官僚資本所腐蝕，都非重新調整，不足適應現代文明。西江流域文化的未成熟性，卻有生長與發展，而貢獻於新中華文明與新世界文化的可能。那是要說，西江流域文化，對於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更富有截長補短、擷精去糟、提煉發揚和批判創造的可能性。本院即把握這種可能性施教，把西江流域文化加以發揚光大，以貢獻新中國，乃至民主、自由、和平的新世界。

雷沛鴻的這番話可謂是語意激昂，期盼殷切。在今天看來，並未實質性地抓住國家現代性、甚至是世界現代性的脈搏，而是基於一種文化本位乃至地方感情而發的慷慨陳詞；但是我們並不能苛求先人。事實上，從地理勢態上看，雷沛鴻在當時也有充分的理由來發此宏論，並非無故之詞。換句話說，雷沛鴻創建西江學院這一教育取徑與當時的地理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那麼，對於我們，有現實意義、研究價值的問題是：當時「未成熟」的西江流域文化是如何在地理勢態上可能貢獻於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呢？

西江流域，在今天的地圖上還可以看到，潯江流經桂中丘陵平原，到梧州匯合之後稱為西

江。西江上游各段分別稱為郁江、邕江等，西江一路眾納百川，航運發達。梧州是西江的樞紐，自漢代到明代，一直是華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因此，可見雷沛鴻的「未成熟的西江流域文化」一說並不完全準確。這一流域以商住騎樓為民居特色，可見這一流域重視商業往來的文化特點⁶。

大致看來，按方言劃分，這一流域為粵方言區。然而，雷沛鴻出生的南寧津頭，當時屬於邕甯縣，古時稱為「邕州」之地，在元朝時使用的卻不是粵語。據《元一統志》記載，元代的邕甯用的是西南官話，與襄漢（湖北）一帶相似，「邕人語言類襄漢」。根據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的研究，粵語是後來從廣東沿西江而上，從而在南寧地區紮根的⁷。方言與地理勢態有關係嗎？如果有，它們之間是甚麼關係？問題的答案是，方言是人文地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根據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理論，「語言是存在的家」，因而，運用這種存在主義語言觀可以將方言與人的存在聯繫起來，方言也成為當時當地人們生活在地理空間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與人的存在相關，因而相因相成、剝離不得。那麼，邕州方言的變遷，使得粵方言在西江流域播散開來，因而也造就了一種方言地理，方言地理的不斷形成，也就奠定了這一流域人們的生存之「家」，加劇了這一流域的內聚力，因而，在這種方言區域中，區域的方言一體化造就了區域的自主性，區域性因而上升為空間性，使得地理勢態超越了行政區域劃分，也就是使用方言之人的內在趨向性、心理趨同性和存在同一性跨越了廣東、廣西的區位劃定。換句話說，流域文化觀念實際上其背後隱藏著方言一體化的認同機制，而不是以人為的區位設置來認同身份的，因為「共飲一江水，同說一種話」的這種存在現狀造就了這富於隱性的地理勢態，這種勢態存活於人的文化心理，隱藏很深、不張揚，不流於現象，因而常常被人為的地理劃分所遮蔽。當雷沛鴻強調西江流域文化這個隱性心理大範圍的時候，很顯然，潛意識地受到這種隱性地理勢態影響。因而，上述引文中，我們看到雷沛鴻的地理劃分標準有兩種，一種是上述的隱性地理勢態；另一種就是是否受到外來影響來劃定，這就包含了人為地理劃分的因素在其中，這種顯明的地理勢態遮蔽著隱性的地理勢態。正是這種矛盾，雷沛鴻使用第一種地理勢態（即西江流域文化概念）來遷就第二種地理概念，因而把西江流域文化的範圍縮小了。在其敘述裏，隱含的語義是，西江流域已經不包括臨東南沿海範圍了，局限於西江流域的邕江部分（下面會談及其中原因）。也正因為這種觀念，他創建的西江學院院址被最終定在南寧。這種矛盾在後來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肇慶大學的前身也沿用「西江學院」的名號；在南寧，出現了以「西江聯合大學」為名號的教學機構，這也可以說是雷沛鴻在判斷當時的地理勢態時種下了因。

二

方言地理勢態只是影響雷沛鴻創建西江學院教育取徑的一個既長且隱的因素，對於地理勢態來說，空間性和時間性的社會過程才是根本因素，它們的運動、實踐在甚麼地方、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雷沛鴻的這種教育取徑呢？我們不得不考察現實世界的因素。

首先，我們注意到，在當時的中國可謂是「亂世」。亂的一個基本狀況是軍閥割據，稱霸一方。根據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研究，當時蔣介石號為總統，實際勢力範圍操控實力卻很有限，更多地集中於大城市，幾乎很難深入到邊陲，更不用說邊疆農村⁸。這種「中央弱、地方強」的狀況，給廣西以自足發展的空間。再加上當時廣西軍政領導的有力支持，雷沛鴻一系列的教育實踐得以開展，這種因軍閥割據而造就的「地理勢態」加強了雷沛鴻發展西江流域文化以貢獻新中國、新世界的信心。這種信心在今天世界現代性、國家現代性⁹鋪天蓋地

麟麟向前，為此等現代性裹挾之地之人就不再具有這種地理勢態和地方自足性、自信心，而地方別無勝策力求政策，即更多的是強調自己的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的地理弱勢、文化貧態以獲得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傾斜。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雷沛鴻光大西江文化的現實力量存在的意義——舉當地之力做當地之事，也可以折射出「地理勢態」變化給人信心的變化。對比當下廣西高等教育，可以看到教育取徑與地理勢態的關係，更可以看到國家現代性中地方主事者的態度、能力等。

雷沛鴻的現實信心還來自於他對其他流域、地域文化的比較。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原文化古舊，東南海岸的低原文化受到侵蝕，都已不是理想的文化，而理想的是「西江流域文化」這一新苗，因其所謂「不成熟」，所以可以培養光大。這是在強大的現實力量支持下烏托邦的理想，是希望人為地推動所謂的「流域文化」在時勢造就下的「地理勢態」下的一種願望。雷沛鴻是一位理想規劃家，更是一個實幹家，他穩健謀劃、扎實打拼；一波數折，不屈不撓地將這一願望付諸行動，落實教育取徑，做出成績，值得後人敬仰。然而，無情的現實最終將他的這種努力付諸東流。因為隨著空間性、時間性社會過程的變化，當時的地理勢態也發生了變化，軍閥的勢力被打破，國家的文化秩序重新編排，國家現代性重新塑形，這種地域文化理想湮沒於附麗於國家大一統的現實秩序當中，當時相對獨立、富有實力的地理勢態讓位於國家現代性的強大敘述邏輯，所發聲音越來越弱，所能作為越來越小，最後成為歷史的陳跡，和當時的地理勢態一起被封存，到現在仍需勞神勞心頗費周章地不斷解碼解密。

一掌之中，指長不一；一省之內，各有強弱。當時的省府設在桂林，桂林成為廣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歷史上看，桂北地區開發較早，歷經各朝各代的積累，整體實力、綜合實力自然較其他地方殷實。而灕江的天然優勢，多受重視，歷代吟詠，其中靈渠溝通長江珠江二水，更是功勞卓著，秦以來歷朝並不偏廢。邕江一帶，也歷經開發，就文化而言，王陽明就建有「敷文書院」成為儒學南傳（特別是傳播陽明心學）的重鎮。在近代，邕江（桂南）一帶的地理優勢逐顯重要，但終非府治之所，不能首善。即使是雷沛鴻時代，其地理勢態仍受首府牽制，所以，雷沛鴻報效家鄉、建設桑梓這種取徑不能說沒有地理勢態的考慮。如果我們的眼光如雷沛鴻般闊大，就會發現，桂林與南寧比較或者說漓水與西江相比較，西江溝通海域的便利，商賈往來的頻仍，地域文化受到資本主義外來衝擊的機會、效應要大得多。而漓水自秦以來重在內陸互通，更多地獲得來自王朝的資訊、資源，歐風雨未必是它的甘霖。這種狀況產生了就的地理勢態。

當然，對於資本主義的衝擊，即上述所提到世界現代性，雷沛鴻在當時的地理勢態下，採取的應對方案是挖掘民間文化。我們將雷沛鴻所提到的「未成熟的西江流域文化」歸屬於民間文化，這主要著眼於當時整個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現代性的強勢邏輯）衝擊之下中國有識之士的應對方案。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更多提出挖掘、培養、造就民間文化以回擊西方文明，抗擊世界現代性（或者說反現代性）¹⁰。雷沛鴻與其他中國學者一道，未謀商量，殊途同歸地以一個地方（雷沛鴻在廣西）、一種民間文化（雷沛鴻以西江流域文化）來救國救民，當然這包含著對原有傳統文化（大致相當於雷沛鴻所說的中原文明）抱殘守闕的失望與痛恨，在這種普遍的敵對與憤恨的雙重情緒下，各自以一地為據點進行實踐，推動了教育的發展，造就了當時多樣的地理勢態。雷沛鴻是當時一位矯矯者，當時學界、政界名流胡適讚揚說：「……廣西教育廳長雷沛鴻先生正在執行全省普及國民基礎的計劃，……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為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眼光的中國人，必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南遊雜憶·廣西印象》）廣西也就因為雷沛鴻等人教育取徑，努力實踐，成為了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地理勢態概念。

我們不能因此說雷沛鴻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相反，雷沛鴻是一位目光遠大的文化交融論者，他說：「依我們教育理想觀察，本院可能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由西江上游追溯到安南、暹羅、緬甸、南洋群島，以至印度、阿拉伯都是我們教育文化的工作園地。」¹¹這種國際性大學的理念，其在文化融合的結果是：「使中華聲教與中南半島，又與馬來半島，以至南洋群島，一帶海洋文化交流，而重新創造中華文明。」¹²這種文化交流的展望基於雷沛鴻對文化與教育二者關係的認識，他說：「文化與教育，乃是二者一體，文化是本，教育是用。文化是教育的內容，教育是文化的選擇、傳遞與創造。」¹³因而，他認為：「文化演進是教育變動的主導，文化變動，教育隨之而變，……教育是傳遞文化的工作，文化是教育的來源。」¹⁴從雷沛鴻這些言論可以看出，他基於對地理勢態的判斷，決定了他的教育取徑，創建西江學院，並希圖發展壯大為西江大學以適應更可以說是創造這種文化交流的機遇。對比當下，以南寧為中國南大門的中國-東盟關係的日益密切，經貿合作引發的文化交流熱潮似乎正應和實踐著雷沛鴻當年的地理勢態判斷，雖然我們說，雷沛鴻的理想認識與今天的操作現狀之間，在文化交流的內涵、外延都不盡相似，但在理念上，在地理勢態的判斷上，卻有太多的共同點，這不能不說雷沛鴻具有先見之明。我們上述說雷沛鴻具有抗擊世界現代性的一面，從這裏我們看到雷沛鴻作為一個「亂世英才」複雜的另一面，他通過自己的實幹，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國家現代性，參與了國家現代性形象的塑造，也參與了世界現代性。這種思想和作為的豐富性與他早年留學哈佛大有關係，更重要的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那就是他在實幹當中具有的對地理勢態的深刻洞察力、判斷力¹⁵。當然，雷沛鴻的「教育為公」等思想對創建西江學院也深具影響，但已不是本文論述範圍，所以從略。

三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西江學院的創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具有複雜歷史背景的合力個案，即它的出現是地理勢態各種因素積聚、角力並與雷沛鴻當時的教育取徑相合駢的產物，是二者合之雙美，離則兩傷的一個結果。我們也應當看到，當二者各自發生變化、產生位移的時候，結果也隨之定型成為古董，並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失去其影響歷史的鮮活作用，與當時的歷史環境一併消失，在後代那裏只陳年舊事，當年掌故如今不過是「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劉禹錫：《石頭城》）。西江學院也正是在這種嬗變中成為歷史的縮影、陳跡。假如要復活先人的遺贈，重新拾起發揚光大西江流域文化的理念及其學院組織，就需要對當時和當下的地理勢態詳加考察、細緻分析，在新的形勢和再次實幹中確立新的教育取徑，使得「理念與實幹齊飛，勢態與取徑一色」，這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也是當代教育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下）、（續），廣西教育出版社，分別於1989、1990、1993年版。

陳友松編，《雷沛鴻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雷堅編著，《雷沛鴻傳》，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蒙蔭昭、梁全進主編，《廣西教育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譚其驥著，《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周振鶴著，《學臘一十九》，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何成軒著，《儒學南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R·J·約翰斯頓著，柴威等譯，《人文地理學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

愛德華·W·蘇賈著，王文斌譯，《後現代地理學》，商務印書館，2004年。

註釋

- 1 愛德華·W·蘇賈著，王文斌譯，《後現代地理學》，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120。
- 2 R·J·約翰斯頓著，柴威等譯，《人文地理學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678。
- 3 本文之所以使用「地理勢態」這一術語，其目的是希圖揭示社會時空結構中，地理空間在錯綜複雜因素的博弈時介於變又未變，不變擬變的這種趨勢、狀態，從而使得社會時空結構中的各種因素都得以動態地表述。
- 4 西江學院由雷沛鴻等人籌辦於1944年6月，1946年9月16日於廣西南寧津頭，分設中國文學系、數學系等，學生300多人。1948年學院不斷擴大，已極具規模；1949年12月4日南寧解放；1950年1月6日南寧軍管會文教部接收西江學院，併入廣西革命大學（今廣西大學前身）。雷沛鴻（1888—1967），字賓南，生於廣西南寧津頭。1906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1913年考取留英公費生資格，到英國讀書，1914年到美國工讀，先後獲歐柏林大學文科學士、哈佛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21年回國，先後五次長廣西教育，對桑梓多有貢獻，特別是在廣西一省開展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更澤惠廣西。雷沛鴻先後擔任公職多種。90年代曾掀起「雷研」熱潮。雷沛鴻事蹟、西江學院史實詳見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曹天忠著，《教育與社會——雷沛鴻與近代教育與社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所以本文不擬就具體史實詳加論述，而是著眼於雷沛鴻創建西江學院的理念及其人文地理學意義。
- 5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458。
- 6 參見雷翔主編，《廣西民居》，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
- 7 周振鶴著，《學臘一十九》，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73。
- 8 參見黃仁宇系列著作，如《大歷史大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黃河青山》，三聯書店，2001年。
- 9 世界現代性大致指的是西方當代社會發展的邏輯，一般稱之為「現代性」，參見安東尼·吉登斯著，《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另見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國家現代性用通俗政治的話說就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但這種簡單的政治話語割裂了現代性的社會理論豐富內涵，因而本文以國家現代性來指稱世界現代性中中國的積極回應過程所帶來的全方位變化。
- 10 參見艾愷著，《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1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492。
- 12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8。
- 13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續），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444。
- 14 韋善美、馬清和主編，《雷沛鴻文集》（上），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26。
- 15 這種實幹、實踐產生的洞察力、判斷力，英國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稱之為「現實感（the sense of reality）」。參見伯林著，潘榮榮等譯，《現實感》，譯林出版社，2004年。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2005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